



袁世凯评传

刘忆江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袁世凯 评传 (上)

刘忆江 著

刘世凯 袁世凯 袁世凯 袁世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世凯评传/刘忆江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4. 3

ISBN 7-80180-271-3

I. 袁… II. 刘… III. 袁世凯(1859~1916)—评传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8196 号

袁 世 凯 评 传

著 者	刘忆江
责任编辑	孙 展
责任校对	刘小利 刘凤珍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编: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3(发行部) 63567691(编辑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mai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49.5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0-271-3/K·010
定 价	80.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近百年来，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史学界对袁均持否定的评价，似乎“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概括袁的一生。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清末民初政局三十余年，作为其创始人和领袖，袁之言论和作为，既有其个人品质、性格的因素在内，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他的评价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所能解决的。

晚清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列强环伺，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变法维新已是全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正如所有改革运动一样，变法也有激进与温和之分：激进派以康梁为代表，其成员多为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轻动躁进，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改革运动一度停滞甚至倒退。温和派多由思想较为开化且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各级官僚构成，主张缓进，在现有条件下，从一点一滴的实际事务做起。这一派走的是洋务运动的路子，而接过曾国藩、李鸿章的衣钵，继续推动清末改良主义运动并成为其主要领袖的人物，正是袁世凯。

中国史学有一个好的传统——知人论世，这与唯物史观强调通过具体的环境与条件来理解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论点是相通的。中国的“史圣”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是为中国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传统。本书写作亦求本此传统，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剖析袁之言论、行事与为人，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谈到读史时曾强调，要想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应认真阅读当时的名臣奏议。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国家重要岗位上担负实际责任的人，他们奏稿中的种种议论和建议，大都针对时弊和实际问题而发，比起不了解内幕和接触不到实际的局外人与后人的空谈，

要有意义得多。故本书尝试以一种新的结构诠释袁世凯：即以其仕途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奏议为纲，以此阶段袁在外交、军事、政治中的活动为目，夹叙夹议，以求较为全面、准确地勾勒出袁的本来面目。全书体例则是将袁的奏议原文列前，前面加一小段导读，点出奏议的时间、背景和目的；下接史事，扼要交代奏议所针对的事件和相关背景资料，揭示奏议背后的故事，侧重分析袁之智术谋略，并加以适当评论。奏议所涉及的某些今天不易理解的称谓、典故、制度及相关史料、书证等，则放入每章后的注释，以备读者随时查阅。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笔记大多是文言文，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除少数易懂的语句外，均译成了白话文，但仍注明出处，以便查对原文。奏折则不加翻译，保存原貌，其内容因已在史事中予以分析和说明，读起来并不困难。全书摒弃时下流行的主观臆造，向壁虚构的恶劣文风，凡引文必注明出处，力求做到言必有征，殊不致误导读者，贻害国人。

长期以来，史学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要么是以论代史，严肃得让人觉得可怕的高头讲章；要么是有骨头没肉，枯燥无味到让人读不下去的断烂朝报。而由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本不如此，他笔下的事件、人物，数千年以后读起来，仍然栩栩如生，如在目前。笔者踵武前贤，尽可能以与袁同时代的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及较为可靠笔记史料说话，而结论则读者自会由史料中得出，笔者之评论则只是提出一种别样的视角，供读者参考。袁世凯作为反面人物，长期以来只是被当作批判的靶子，而未能得到认真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有关袁的文献资料也未得到系统地整理和出版，因而做为在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历史人物，其公私文献，尤其是早年和晚年的部分是很不完全的，故本书亦难免挂漏。好在本书作为文史读物，目的只在抛砖引玉，提供诠释历史人物的新视角，而非对袁之为人事业的盖棺论定。

改良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上或显或隐的主题，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重要问题。中国在一个孤独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了几千年，直到遇到西方近代文明的空前挑战，才从“中古状态”的沉睡中逐渐醒来。在起而应战的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开始分化：始而强大渐而衰落的保守主义，始而弱小渐而强劲的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在成长中又进一步分化出激进派和革命派。激进派主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主义一度抬头，但很快将中国拖入灾难，其势力也随之瓦解。庚子事变

后，改良主义再次主导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即使辛亥革命也未能终止改良主义的势头。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是有过很大的成功机会的，晚清新政实已造成了中国改良主义的思想、社会基础，但很可惜的是，作为改良主义后期领袖的袁世凯昧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当皇帝，开倒车，最终葬送了自己开创的渐进改良的大好局面，导致了改良主义运动的蹉跎，其后几十年，中国即陷入内战、革命和外患不断的动乱之中，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进程中断，至今仍追赶不上西方现代化的脚步。所以深入研究改良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总结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家、民族的复兴大业，应该有重要的借鉴和反省作用。

前 言

1

第一章 早年生涯

1

一个走出了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士绅子弟。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可以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第二章 初露峥嵘

11

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在朝鲜的两次事变中，年轻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

第三章 外交“双簧”

47

外交战场上的诡谲多诈，十二年的纵横捭阖，造就出袁世凯的枭雄素质。

第四章 好风凭借力

95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李鸿章成就了袁世凯；袁世凯亦凭借李的声望发展自己，最终成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

第五章 送“高帽”的学问

123

李鸿章失势后，袁世凯的事业转入低潮。为另觅官场靠山，袁大送“高帽”，其善于揣摩、投人所好而又不露痕迹的手法可见一斑。

第六章 夤缘权门，结交有术

141

袁世凯在甲午之后兴起的变革思潮中，与康、梁等一样，作为亦新亦旧的一代人，维新志向与官场钻营看似矛盾，却可以并行不悖。

第七章 小站班底

165

袁世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用人。与历代枭雄人物一样，袁之用人也是不拘资格，不限流品，选贤任能，惟才是举，有足以供后人借鉴者。

第八章 改良偏方

205

胶州湾事件引发瓜分危机，变法维新声势再起。袁世凯的变法条陈未被采纳，却使他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第九章 局外人的收益

229

因握有兵权，百日维新之中，袁世凯成为新旧两派都要争取的人物，由此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收益。

第十章 诡谋杀机与告密自保

289

本想置身事外，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为求自保，袁世凯告了密，做出了一个实用主义官僚本能的抉择。

第十一章 庚子事变中的袁世凯 323

庚子事变将中国拖入灾难，袁世凯因缘时会，左右逢源，将接手的烂摊子转变成为自己发迹的大机会。

下**第十二章 新政先锋** 383

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重新启动的变法中，袁世凯名至实归地成为晚清改良主义运动的新领袖。

第十三章 日俄之战与北洋扩军 437

多年来在人才和军事教育上的储备，使袁世凯得以在危机到来时把握住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使陆危的国势得以缓解，也造就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陆军。

第十四章 维新跨进一大步 469

晚清新政中，袁世凯开风气之先，带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变法举措，站在了历史进步的潮头。

第十五章 官场政潮 517

作为头脑精明、手段圆滑的官僚，袁世凯在官场斗争中游刃有余。可一旦失去了最高层的保护伞，也不免于败下阵来。

第十六章 鼎革前后 583

鼎革之际，袁世凯沉机默运，因势利导，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帝政到共和的转变，展现了

出色的政治智慧。然而他终究是旧时代造就出来的人物，并无真正的共和理念，绝难做华盛顿式的事业。

第十七章 “二十一条”本末 653

“二十一条”交涉的内幕如何，袁世凯是否用卖国做了交易，九十年后，随着有关资料的逐渐发现和公开，我们终于能够坐下来冷静地分析一下那段沉重的历史。

第十八章 洪宪末路 693

帝制自为，身败名裂，不仅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与近代化运动的悲剧。个人的失误导致民族与国家的灾难，究其根源，还在于体制的不善，也可见社会转型之艰难。

附录一 项城袁氏世系表 757

附录二 袁世凯之配偶、子女及姻亲表 758

附录三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名单 760

附录四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代行立法的政治

会议、约法会议和参议院人员名单 762

跋 767

后记 771

第一章

早年生涯

一个走出了封闭的
乡土社会的士绅子弟。

从青少年时代的

袁世凯的身上，

可以看到他日后

所作所为的影子。



图1 袁世凯与生母刘氏的合影。

(河南项城市博物馆提供)

【导读】本章开头没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袁世凯还没有进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后来不仅成为历史撰述的传统，而且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袁世凯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他所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袁的行事、为人和言论。通过其早年生涯，我们可以在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成就成个什么样的人，全在于因缘时会。这与唯物史观强调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晚年昧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帝制自为，落了个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但这否定不了他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对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中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树立了一种“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在对袁世凯其人其事其言的评述中将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设身处地，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尽可能透视出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袁氏是当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树三这一辈，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树三之弟袁甲三(世凯之叔祖，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查御史、兵科给事中，一直做到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漕运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军功起家，多次蒙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死后赠谥“端敏”，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荣耀。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军功升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补道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树三次子，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随袁甲三从军，以军功侯补济南，后调任江苏，署理江南盐运道。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捐过一个同知，但由于他是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老宅主持家务，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门两世簪缨，不仅成为当地的高门显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场上也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为袁氏子孙将来的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859年9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家庭里。他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不久，其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



图2 袁氏故居中的一角,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即诞生于此。

(孙展摄)

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缺乏奶水，而牛氏的奶水却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视世凯如己出，疼爱异常。1866年，袁保庆以知府衔候补济南，当时年纪已过四十，仍然没有子嗣，袁保中便将世凯过继给了弟弟。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法人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发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义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世凯传授



图3 袁寨今景。袁寨原名石腰庄，是明末官宦石氏之庄园。1858年，袁保中与袁重三（袁世凯叔祖）斥巨资，从家道中落的石氏手中买入此处庄园，加筑寨堡，袁氏遂从项城袁张营村举族迁居于此，改称袁寨。袁寨建筑规模宏大，总占地二百七十余亩，楼瓦房五百余间，分设住宅、家塾、兵营、花园等。其中住宅占地五十余亩，房屋二百六十六间。寨墙呈方形，四角筑有碉楼，外有三道寨河，吊桥高悬，防卫森严，是当时中国聚族而居的大户人家典型的防御式寨堡。

（河南项城市博物馆提供）

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积不相能，时生龃龉，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两人都很喜欢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袁世凯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法式家庭往往几世同堂，家口众多，人际关系复杂。项城袁氏就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练达的素质，与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文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世凯读书上进。如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文，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的调教，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剧，常教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世凯当年随嗣父学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办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先是，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此时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

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本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²”，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子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³”，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⁴。”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闹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闹，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篋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齷齪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⁵”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

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楨）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